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5.003

试论梁漱溟文艺美学的生生特性

刘艳芬

(济南大学 文学院, 济南 250022)

摘要:梁漱溟中年方关注艺术的价值和功能,并形成了具有生生特性的文艺美学思想。他坚持生生立场,认为文学艺术贵真,文学艺术创作是一个为美“刺激感染”、由身达心的创生过程。针对个体生命而言,文艺具有“使人情绪发扬鼓舞”的审美特征和作用;针对社会生命而论,文学艺术则是人生的一种依靠,是精神食粮,能滋养人类乃至动植物。在此基础上,梁漱溟进一步从生命本身的活泼流畅特性出发,主张个体应当摒除外物纷扰,借由直觉达到生机的活泼,培育温和安畅的仁心,进而滋养生命的“活气”与“朝气”,并由人心推衍至人生和社会,倡导以道德和美育代替宗教,提出未来社会人生艺术化问题。

关键词:梁漱溟;文艺美学;人生艺术化;生生美学

中图分类号:I0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5-0014-08

梁漱溟以整体性思维建立起的中国化的生命哲学,不仅气势恢宏地讨论了人心关联宇宙本体、人生与自然万物共生等哲学问题,而且探讨了文学艺术的价值与特征,并进一步提出了人生艺术化的问题,这使他的生命哲学高出了一般哲学而具有了生生特性。所谓生生特性指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所秉持的整体思维、动态观念和不断创生的思想。梁漱溟曾自言其“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749}。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梁漱溟虽然无意建构独特的美学框架,但其对社会、文化、思想等庞杂内容进行论述时亦有一些关于文学艺术及其美学特性的认识,而且其中蕴含着生生特性,这也构成了他独特的文艺美学思想,本文试对此加以探讨。

一、“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文艺的生生之美

梁漱溟成名于24岁,那时他是轻视甚至否定文学艺术的,直到30岁才开始重视并研究文学艺术,提出了一系列颇有识见的观点。他认为文学艺术贵真求美,而美即感动人心、激发人的真情,

不论是文学艺术的创作,还是欣赏,都是由身达心的创生过程。

(一)梁漱溟对艺术的态度经历的三个时期

梁漱溟对艺术的态度受到了社会发展以及个人经历和思想变化的影响,可分为三个时期:20岁前“重事功而轻学问”,20—29岁之间否定艺术的价值,30岁之后肯定艺术的价值。在他晚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中曾将自己一生的思想转变分为三个时期,他说:“其第一期便是近代西洋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1]601}在第一期,他对“具有实用价值底学问,还知注意;若文学,若哲学,则直认为误人骗人的东西而排斥它”^{[2]40}。在第二期,他力图寻求一条救国救民之途,在哲学和社会领域上下求索,对于艺术,虽然不再盲目排斥,但仍持一种消极的否定态度。这集中表现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认为“文学如诗歌、赋、戏曲”,虽然有很多“聪明精巧之处”,但“总觉也少伟大的气概,深厚的思想和真情”;“艺术如音乐、绘画”,也许“有非常可贵之

收稿日期:2024-06-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生美学与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与创新研究”(23&ZD280);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文艺美学思想发展与中华美学精神研究”(22JJD750029)

作者简介:刘艳芬(1969—),女,山东聊城人,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处,然似只为偶然一现之文明而非普遍流行之文化”^{[3]480}。同时,他还从心理学角度指出属于文学艺术的“美术”不如宗教有力量,“本来人的情志方面就是这宗教与美术两样东西,而从来宗教的力量大于美术,不着重这面则已,但着重这面总容易倾在宗教而觉美术不济事”^{[3]522}。第三期即30岁后,他开始关注到文学艺术,并肯定其意义和价值。他在《朝话》中谈戏剧时,认为文学艺术自有意义,值得肯定和欣赏。他说:“我对文学艺术之类老用不上心去;可是在我心中常存一个意思,就是觉得这里面宝藏着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值得欣赏。”^{[4]121}谈及音乐时,他说:“我对于音乐历来是看得很重的,因为它可以变化人的心理,激励的人格。我觉得中国之复兴,必有待于礼乐之复兴。”^{[4]122}由此可见,梁漱溟对文艺的态度和其一生的思想探索是密切相关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是梁漱溟晚年对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总结而写成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在其中辟专章讨论文学艺术,分析了文艺的特征,并充分肯定了文艺存在的价值和功能。

(二)“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论文学艺术的特征

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以普遍联系的生态思维分析了文学艺术问题,提出文学艺术贵真、“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的观点。在第十九章“略谈文学艺术之属”中梁漱溟说:“文学艺术总属人世间事,似乎其所贵亦有真之一义。然其真者,谓其真切动人感情也。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而感情则是从身达心,往复心身之间的。”^{[1]744}此处梁漱溟将美概括为“真切动人感情”,指出了文学艺术由真而生美的过程:真切动人的感情从身达心,在身心之间往复,美(美感)就出现了,因此由真而生美是文艺的特性,这与科学、哲学的求真完全是不同的。他还通过感官和环境的关系来进一步讲这一问题:“人的个体生命即人身,通过其种种感觉器官与环境相接乃发生感觉、感情,一切文学艺术总都建立在这上面。”^{[1]745}此处把感觉、感情的产生追溯到“感觉器官与环境相接乃发生”的观点,是与其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和“任万物生”的自然观为基础的,万事万物都是活的,因动而生,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情感者人心之波

动也”^{[1]628}。在《人心与人生》第九章“人资于其社会生活而得发展成人如今日者”中,梁漱溟从发生学的角度,指出语言是人类独有的表达情感的媒介,因为人比动物“情感发达”且需要表达,他说:“唯其情感发达有力,乃有其代表的声音冲口而出。最初之语言,殆不外激迫叫喊,彼此召唤,高兴欢呼,悲啼泣诉之类也。”^{[1]628}他进一步分析指出真挚的情感是人心波动的表现,只有内心安静,情感才能波动,静中寓动的情感波动才能产生美。他说:“此特见发达之情感,则导因理智之得解放于动物本能。情感者人心之波动也;唯其能静,斯其所以能动。”^{[1]628}可见,梁漱溟以本能与理智等现代心理学术语分析了情感(美感)产生的过程,揭示了文学艺术最根本的美学特征,深化并现代化了由陆机《文赋》所开启的“诗缘情绮靡”的文学审美传统。心动而生情,情动而生美,美而生文艺,这是梁漱溟的文艺思想逻辑。

不仅如此,梁漱溟还把文学艺术创作视为美“刺激感染”、由身达心的创生过程。他以感染力来论情感,以感情的深浅厚薄论美,又以美来论文艺。他认为文学(诗歌、词曲、小说、戏剧、电影等)和艺术(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建筑等)可以用美或不美来评价,美不仅悦耳悦目,而且可以怡神解忧。那么,创作者是如何创作出美的艺术品的呢?他说:“美之为美,千百其不同,要因创作家出其生命中所蕴蓄者以刺激感染乎众人,众人不期而为其所动也。人的感情大有浅深、厚薄、高低、雅俗之不等,固未可一例看待。”^{[1]745}梁漱溟细致描述了美感的生生过程:一种事物悦耳悦目,让人忘掉忧愁而感心旷神怡,创作者受到“刺激感染”,唤起“生命中所蕴蓄者”,蕴蓄越深厚,创作出的作品“刺激感染”力越强,越能让欣赏者情动于衷,与作者产生共鸣。所以,文学艺术创作的过程不是审美体验的传递过程,也不是情感的移植,而是由美“刺激感染”,由身达心,“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互相激发的创生过程。对此,他还补充强调创作者应是心理学家,“必于自身和他人的本能活动深有体察会悟而后能刻画入微以动人”^{[1]748}。此外,梁漱溟强调文艺要“真”的原因是其认为作者要有真实的人生体验和感受。他说:“只有超过文学能产生文学;有意乎文学,其

为文学反倒有限。因他没有真的人生,对人生的酸甜苦辣无深刻体会,所以不会产生文学;即有文学,亦难产生极有价值的伟大作品。”^{[4]85}可见,梁漱溟认为文艺创作者感情深浅的不同会影响其作品美感,只有生命中蕴蓄深情即“对人生的酸甜苦辣”有深刻体验和感受的作者,才能摇荡性情,创作出能够激发欣赏者感染力的伟大作品。

(三)“使人情绪发扬鼓舞”:论文艺的审美特征和价值功能

梁漱溟文艺观的生生特征还表现在其对文艺的审美特征和价值功能的探讨上。对此,他分别从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从个体生命层面论述了文艺具有“使人情绪发扬鼓舞”的审美特征和作用,从社会生命层面论述了文学艺术是人生的一种依靠,是精神食粮,能滋养人类乃至动植物。

在个体生命层面,梁漱溟认为文艺具有“使人情绪发扬鼓舞”“变化人的心理,激励人的人格”的作用。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朝话》和《人心与人生》中。《朝话》是梁漱溟于1932年至1935年间与学生作朝会时的部分讲话辑录。在《朝话》之《谈戏剧》一文中他说:“戏剧最大的特征,即在能使人情绪发扬鼓舞,忘怀一切,别人的讪笑他全不管。有意的忘还不成,连忘的意思都没有,那才真可即于化境了。能入化境,这是人的生命顶活泼的时候。化是什么?化就是生命与宇宙的合一,不分家,没彼此,这真是人生最理想的境界。”^{[4]119-120}梁漱溟认为戏剧的情境性和情感性会激发鼓舞人的情绪,进而达到“生命顶活泼”的化境,即“人生最理想的境界”,这里对戏剧作用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在《朝话》之《谈音乐》中,他认为音乐的研究和创造依赖于天赋,并把音乐的发展和礼乐的复兴相关联。他说:“在国内对音乐有研究有创造的人真是太少;这种东西,必有真的天才才能有深厚的造诣。”^{[4]122}在《谈生命与向上创造》一文中,他说生命是“活的相续”,是“向上创造”,而“如诗文书画,兴来从事,则觉特别灵活有神”^{[4]93}。在梁漱溟看来,生命和艺术同为“灵活有神”的异质同构体。在《谈戏——山东省立剧院周年纪念会演讲词》中,梁漱溟讲到戏剧需要天才的观点。他说:“虽有戏剧专家,虽有

哲学专家,这只好让有戏剧天才或是哲学天才的人去作,普通人是不可行的;不应使许多人以他为职业。”^{[4]138}接着他还补充说:“我这里所说的戏剧包括的很宽,如音乐、诗歌等都在内。”^{[4]138}可见,梁漱溟所说不仅限于艺术的某种类型,而是广义的艺术,同时他也分析了广义“艺术”的功能。说:“艺术正好与此相反,它处处是发舒、流畅,给人得到当下的满足。”^{[4]137}在《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认为这种使人情感发舒流畅的美感的发生就是一个生生的过程:在对文艺作品欣赏的过程中,本能会使人感受到文学艺术的不同美感。梁漱溟认为“基于生理上男女性的本能之强,凡有关乎此的第一信号如某些彩色,某些声音,某些气味等等,或第二信号中如某些词句语调,乃最能引诱人的兴味,最能召致人的美感”^{[1]747}。本能能够影响文学艺术创作的题材和体裁,比如斗争的本能“极能引发人们兴奋豪情,具有刺激美感、快感之力”^{[1]747},因此人们崇拜英雄,画家常画狮虎,同时这种本能也影响受众群体的审美趣味,“又如武侠小说,惊险影片,某种舞蹈姿势,球类竞技等等,其引发人们兴趣,成为群众娱乐之事者,要莫不在此”^{[1]747}。在此基础上,梁漱溟还结合文学作品进一步分析指出:“生命得其畅快流行则乐,反之,顿滞则苦闷。”^{[1]748}但文学作品中的喜或悲与生活中不一样,悲剧似乎有更深刻而持久的效果。他说:“是故文学作品(小说、戏剧)引人嬉笑固俗所欢迎,其使人堕泪悲泣者乃具更大吸引力。二者同样促使生命流行,然前者(嬉笑)之动人感情不免浅薄,而后者(悲恻)之动人却深得多也。”^{[1]748}不论是喜还是悲,文学艺术给人带来的都是生命的和谐流畅,这种生命的和谐流畅正是文艺价值的集中体现。梁漱溟还特别推崇“意境甚高的艺术作品”,如陶渊明的诗,倪云林的画等,认为它们可以“感召高尚深微的心情,彻达乎人类生命深处,提高了人们的精神品德”^{[1]749}。可见,梁漱溟从个体心理的角度,从戏剧、音乐到诗文书画,乃至小说、戏剧、电影等,细致分析了文学艺术所具有的使人情感发舒流畅的作用,并阐明了原因。

在社会生命层面,梁漱溟认为文学艺术是人生的一种依靠,是精神食粮。在《朝话》之“谈音乐”中,梁漱溟把音乐与礼乐联系在一起,指出:

“我觉得中国之复兴,必有待于礼乐之复兴”^{[4]122}。1935年在《谈戏——山东省立剧院周年纪念会演讲词》中,在讲了艺术使人情感发舒流畅的作用后,也强调了礼乐。这些关联礼乐来谈文学艺术价值和功能的言论,都是他从社会生命层面来研究文艺价值的明证。在1949年11月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之“绪论”中,他明确指出音乐戏剧等“一切游艺”是人生所依靠的精神食粮。他说道:“然而人生需要,岂徒衣食而止?故流行有‘精神食粮’之语,从其条畅涵泳吾人之精神,而培养增益吾人之精力以言之,则说为一种依靠,亦未为不可耳。”^{[1]9}让人深感惊奇的是,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的许多文艺美学观点带有鲜明的生态意味和生生特性。在《人心与人生》第十二章“身心之间的关系(下)”中,梁漱溟以生命本原相同为基础,分析论证了音乐不仅能感动人,还能感动动植物的道理。他说:“生命本原是共同的,从而一切含生之物,就自然是都息息相通的。譬如音乐感人,世所共知;音乐亦且能感动得动物,甚至感动得植物。曾见北京《参考消息》刊出外国通讯社的报道,有时音乐演奏可使乳牛产乳量增多;乃至对于植物生长,音乐亦且有其效用而不虚,非其明征乎?”^{[1]645-646}梁漱溟以事实为据,指出了音乐不仅能感动人,而且能感动动物植物,利于它们生长。这种艺术效用论看似夸大了艺术的功用,实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科学的,有明显的物种平等观,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论断。在《人心与人生》之《略谈文学艺术之属》中,梁漱溟从真、善、美的关系入手对文学艺术的作用加以分析,他说:“真、善、美三词常见于世,三者固皆人生所有事”,“一般说来,‘真’是知识;‘善’是行为;‘美’是感受。”^{[1]744}在社会生活中,“真”所代表的科学知识可以在社会中应用,“善”所代表的社会行为,则促进人们和谐相处,美所代表的艺术感受则使人身心愉悦、精神畅达。最后梁漱溟还以生命力来论古代东方艺术的浑朴雄壮之美,并由此区分了东西方不同的艺术及其价值,他说:“在文化早熟之古东方每见有上三千年或更古的陶冶、铸造或雕塑建筑,艺术价值极高,大为后世之所鉴赏者。盖其人方当开化非久,身体既浑朴雄壮而又内慧早发,生命力卓越后世难可企及

也。”^{[1]749}梁漱溟认为只有活的才是美的,文学艺术是美的艺术,因为其表现的是生命力的活泼畅达和生生不息。

综上所述,梁漱溟30岁以后重视艺术的价值和功能,坚持生生立场,认为文学艺术贵真,“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文学艺术创作是一个为美“刺激感染”、由身达心的创生过程;从个体生命层面而论,艺术具有“使人情绪发扬鼓舞”的审美特征和作用,而从社会生命层面而论,文学艺术则是人生的一种依靠,是精神食粮,能滋养人类乃至动植物。

二、“乐者,是生机的活泼”:人生从现实到理想

梁漱溟的生命观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尽管他在《人生的省悟》中说他所谓“生命”受到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以及医学的影响,但其浑整一体的思维方式将这些思想融合在一起,他多次提到人类生活的核心就是人心,人心就是他所谓的生命,而人生乃是生命自觉的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梁漱溟全部的思想都是围绕着人生来讨论的,这种人生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关于现实的人生,他认为生命应“生动活泼有力”,充满“生机”和“朝气”,如果能如此就能得到人生之“乐”,实现人生的艺术化,从而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

(一)“奋进向上”是生命之本性。梁漱溟倡导生命的主动性与活泼性,认为“奋进向上”是生命之本性,而这种前进上升的生生之流是畅行自如的。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之第四章“主动性”中指出:“一切生物的生命原是生生不息,一个当下接续一个当下的;每一个当下都有主动性在。而这里所说人心的主动性,则又是其发展扩大炽然可见的。曰努力,曰争取,曰运用,总都是后力加于前力,新新不已。”^{[1]553}此后,他还讲述了艺术创新不是有意求新,而应是“生命所本有的生动活泼有力”^{[1]554}的自然展现,并进一步论证了“生命本性可以说就是莫知其所以然的无止境的向上奋进,不断翻新”^{[1]555}。在第十二章“身心之间的关系(下)”中他又指出:“生物为生命之所寄,乃从而生生不已,新新不住。……生物演进,花样翻新,物种层出不穷,要均来自生命向上奋进之势。”^{[1]648-649}然而,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喜怒哀

乐无时不有,要实现生命流畅自如之乐,就必须破除我执,明白意识产生于念念相续之生命,不应借外物引发生命变化,而应从生命本身出发,进入自然而然的生命流行状态,把握生命本体。1966年秋,梁漱溟撰写了《儒佛异同论》,他说:“人生真乐必循由儒家之学而后可得……乐寄于生命流畅之上,俗话说‘快活’两字,实妙得其旨。所不同者,世俗人恒借外来刺激变化以求得其流畅,而高明有修养(儒学或其他)之士则其生命流畅有不假外求者耳”^{[5]75}。生命本性奋发向上,即使现实困窘艰难,也要追求“生命流畅”,与物同理并超然物外。在约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勉仁斋读书录》之《晦翁学案摘抄》中,他又指出:“生命流行不息,喜怒哀乐虽隐微之极却亦无时不有。”^{[6]849}这种把人的生命与宇宙密切关联、互相影响互动、生生不息的思想,贯穿于梁漱溟的思想成熟期,虽然残留着明显的佛家思想痕迹,却因融合了儒家思想的“生生”理念,而让人耳目一新。不仅如此,梁漱溟还将生生思想运用于艺术创新,揭示了艺术与生命共有的自然活力与本然动力,突出了其人生艺术化和艺术人生化的立场,为“诗意栖居”的人生理想找到了理论依据。

(二)生机的活泼畅达即是“乐”。梁漱溟认为生命的主动性与活泼性表现为“生机”和“朝气”,生命流行的本然状态就是生机的活泼畅达,纯任天机,借由直觉达到生机的活泼,培育温和安畅的仁心,进而滋养生命之本——“朝气”。梁漱溟在1923—1924年所写的《孔家思想史》中对此论述颇为细致,其中提出了“仁”是一种活气或“朝气”的观点,他说仁之体“即是活气,即是心境”^{[6]900}。“仁就是很活泼很灵敏的样子,不仁就是很淹滞很呆板的样子。最要紧是,仁是心境很安畅很柔和很温和的样子,不仁就是不安畅很冷硬很干燥的样子。”^{[6]900}这段话由儒家的核心思想出发,认为有朝气的生命才可谓“仁”,“仁”是人生命活泼的象征,生命的本来面目就在于生机、活气。人应当以生命的活泼、畅达为根本,顺从生命本然而然的流行变化规律,亦即任天机之自然。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乐”的问题,他提出:“真正所谓乐者,是生机的活泼。即生机的畅达,生命的波澜也。”^{[6]906}他又通过日常生活实例

来说明“故生机畅达洋溢则乐,不畅则苦。此所谓新与调和,即前讲仁时所谓活气。”^{[6]906}他又结合看戏、听音乐等艺术欣赏活动和做学问,指出:“讲学问有滋味也是如是。所谓有兴味者,就是生机畅达。所谓干燥者,就是生机不畅。”^{[6]906}最后归结到生命本然是动态的,无需外力拨动,也无需人去寻找,“生命原来是动的,自然流行的,畅达洋溢的,并不要外面来刺激,来拨动。”^{[6]907}“一找畅达抑扬的生机便停滞了”^{[6]907}梁漱溟认为孔子作为圣人,无需外力即可实现生机畅达,乐在其中;同时,“孔子的意思就是告诉人不要找,不要多加一点。只看当下,便是纯任天机。任天机即是生命之理流行。万起万灭则乱了生命之理”^{[6]912}。这样,梁漱溟通过原道、征圣两个环节就将生机活气论述得很充分而具体,指出生命本然的状态是活的,生机活泼畅达则为乐,不畅则为苦,而这种生机畅达取决于自身内在的精神气。

值得关注的是,在1936年出版的《乡村建设大意》中,梁漱溟把生机活气论推广为乡村建设甚至全天下之事了。他指出:“天下事无论什么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本身有生机有活力,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譬如一棵树木,必须他本身有生机,才能吸收养料(水份、肥料、阳光等)。一个小孩子必须是活的,他才能够吃东西。一家里头有生机,一家才能渐往好里去;一村一乡里头有生机;一村一乡能渐往好处去。”^{[3]617-618}在此他已将“生机活气”视为一棵树、一个小孩、一个家、一个村、一个乡的生命根本。梁漱溟把“仁”解释为生命本然的“生机”“活气”,确是一种天才的创见,因为这就将善与美自然连接起来,而这种富于生机活气的美正是生生之美,是“很活泼很灵敏的样子”,由此,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几乎就变成生生美学了。多年之后,杜维明作为新儒家的代表学者,提出了“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问题^{[7]217},其实梁漱溟的生机活气论本身已揭示并在一定程度上阐发了儒家的这种生生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

综上,梁漱溟在思考宇宙大生命和人生时,已然超越了援儒解佛的方式,也超越了是儒是佛的纠结,将生命本性视为不离“我执”的真实存在,

是时时更新、生机灌注的“我”、是与“众生”息息相关的“我”，道德观和艺术观逐渐融合在一起。他认为，生命流畅则得其乐，而艺术能够起到使生命流行畅达的作用。

三、“让生命和谐”：人生艺术化

梁漱溟的探讨由人心而至人生，进一步提出了未来社会人生艺术化的问题，试图以道德代替宗教，构建美好和谐的社会。梁漱溟将其生命存在论辐射到他的文艺观，并通过人生艺术化这一问题融合在一起：这种关联人生艺术化的文艺美学观不囿于文学艺术范围而呈现出生意勃发的绵延性，这种从哲学出发、与文艺美学密切关联的人生艺术化则有别于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家。在《人心与人生》中辟专章《未来社会人生的艺术化》来讨论人生的艺术化问题。其实梁漱溟主张人生艺术化的观点由来已久，并非只是晚年所倡导的。对于人生艺术化的问题，梁漱溟主要从儒家礼乐、心理学、未来社会三方面加以论述。

(一)从儒家礼乐观念即伦理学的角度来谈人生艺术化，并以周公和孔子为榜样。1930年在《散篇论述》之六《解一解中国的谜》一文中，梁漱溟就主张以中国的礼乐来归复人的活跃生命的问题。他认为周公：“他使你无所得而畅快，不是使你有所得而满足；他使你忘物忘我忘一切，不使你分别物我而逐求。怎样能有这大本领？这就在他的‘礼乐’。”^{[8]77}梁漱溟认为，周公的礼乐制度能够使个人忘却倾逐外物的烦扰，使生命复归活泼流畅，实现生生不已、新新不住的“乐”的状态。在1934年的讲话稿《孔子学说之重光》中，他讲到“平常人都是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管不了自己，自己拿自己没办法”^{[9]7}，而孔子则“毕生致力就在让他自己生活顺适通达，嘹亮清楚”^{[9]7}，所以“孔子的学问是最大的学问，最根本的学问”^{[9]8}。在《朝话》之《人生在创造》一文，梁漱溟提出了艺术上的“成己”就是社会上的“成物”的观点，将人生和艺术密切关联。他说：“细研究起来，如一个艺术家，在音乐美术上有好的成功，算是成己呢？算是成物呢？从他自己天才的开展锻炼一面说，算是成己；但同时他又给社会和文化上以好的贡献了，应属成物。”^{[4]95}在《人心与人生》中，晚年的

梁漱溟更是主张礼乐能使“生命之变化流通”，和宗教与艺术一样“大有助于社会人生之慰安行进”^{[1]755}，所以提倡以道德代替宗教，实现人生艺术化，达到诗意栖居的主张，梁漱溟说：“这得之于艺术魔力，非止于种种艺术的感受，而且因为自己在参加着艺术化的一段现实生活。这种生活便是让人生活在礼乐中。礼乐是各大宗教群集生活所少不得的。”^{[1]753}“礼乐之为用，即在使人从倾注外物回到自家情感流行上来，规复了生命重心，纳入生活正轨。”^{[1]756}此处梁漱溟看到了艺术和礼乐对人的积极作用是“使人从倾注外物回到自家情感流行上来”，主张发挥道德和艺术的作用，代替宗教对整个身心发挥着影响，发挥“艺术魔力”，构建充满艺术氛围的美好社会，那时个体和礼乐统一，“成己”“成物”等同，道德和艺术相融。

(二)从心理学角度谈人生艺术化。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就向学生讲过《道德为人生艺术》一文。他指出道德“即是生命的和谐，也就是人生的艺术”^{[4]87}，并进一步从心理学角度加以解释说：“所谓生命的和谐，即人生生理心理——知、情、意——的和谐；同时，亦是我的生命与社会其他的人的生命的和谐。所谓人生的艺术，就是会让生命和谐，会作人，作得痛快漂亮”^{[4]87-88}。他把人生的艺术概括为生理心理的和谐，生理心理的和谐就会使“生命流露精彩”^{[4]88}，“这与写字画画唱戏作诗作文等作到好处差不多”^{[4]88}。在《人心与人生》中，有专章专节即第二十章“未来社会人生的艺术化”第二节“以美育代宗教”，从社会心理讲到礼乐是“情感振发流畅”的表现，“心理有什么，面容体态表现出什么。个人如是，群体则更有所举动。这都出自生命的自然要求和发作”^{[1]755}。

(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谈人生艺术化。在人生观方面，梁漱溟始终倡导积极向上的生命态度，认为人的生命要流畅和谐方能得其情趣。在展望未来社会时，梁漱溟主张发挥礼乐的作用，以美育实现道德的功能，建构充满艺术气息的理想社会。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之第十九章“略谈文学艺术之属”中指出：“假如整个社会人生艺术化——从人的个体起居劳动以至群体的种种活动，从环境一切设施上主动被动合一地无不艺术

化之,那应当是人类文化最理想优美的极则吧!”^{[1]746}在第二十章“未来社会人生的艺术化”中,梁漱溟对未来的社会人生展开构想,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以至共产社会时期”,“那时道德生活不是枯燥的生活,恰是优美文雅的生活,将表现为社会人生的艺术化”^{[1]750}。“人们行事自觉自律之本的优美感情、高尚品质,如何予以涵养和扶持的具体措施,且亦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途中定将逐渐出现的。这就是在生产劳动上在日常生活上逐渐倾向艺术化,例如环境布置的清洁美化,或则边劳动边歌咏佐以音乐之类。”^{[1]761}梁漱溟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阶级既泯,国家消亡,宗教失势,艺术昌盛,人们可以从各自的性情出发,天机活泼,和乐恬谧,彼此顾恤,融洽无间,环境整洁优美,日常生活艺术化审美化,人们一边劳动一边唱歌或欣赏音乐,生活无比美好。

梁漱溟对人生艺术化的探讨是立足于其宇宙观和生命观之上的,它融合了身与心、情感和德行、人生与人格、个体与社会、哲学与艺术、理论和实践等诸种关系,是其气势恢宏的宇宙观中的一部分,也是其文艺美学思想的哲学深化和社会学延伸,是对人的本然生命力活泼生动本性的揭示。他所谓人生艺术化是指将艺术融于生活、礼乐统一、“环境布置的清洁美化”“优美文雅的生活”,即人们“自觉自律”、生理心理和谐畅达、“边劳动边歌咏”充满生机朝气的的生活。对于中国现代美学中的人生艺术化问题,杜卫、金雅等学者曾作专著加以研究,但其中对梁漱溟的有关思想较少涉及^[10-11],笔者以为梁漱溟的人生艺术化思想是由探讨宇宙生命活的本性出发而落到生生不已的艺术人生现实或未来社会的,是哲学家的人生艺术化理论,是他漫长的一生上下求索的精神旨归。这有别于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家从美学出发阐发人生艺术化的理论。

总之,梁漱溟从生命本身的活泼流畅特性出发,主张个体应当摒除外物纷扰,借由直觉达到生机的活泼,培育温和安畅的仁心,进而滋养生命之本——“活气”与“朝气”。同时,梁漱溟基于生命与宇宙相通相融的“万物一体”论,认为个人生命是宇宙生命的核心,并由人心推至人生,进一步提出了未来社会人生艺术化的构想,是“中国传统

形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12]。

梁漱溟的生命哲学以人为核心,又以其浑然一体的思维方式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以“生生”观念来解读文学艺术的特征,认为文学艺术贵真、“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文学艺术创作是一个为美“刺激感染”、由身达心的创生过程;针对个体生命而言,文艺具有“使人情绪发扬鼓舞”的审美特征和作用,而针对社会生命而论,文学艺术则是人生的一种依靠,是精神食粮,能滋养人类乃至动植物。在此基础上,梁漱溟从生命本身的活泼流畅特性出发,主张个体应当摒除外物纷扰,借由直觉达到生机的活泼,培育温和安畅的仁心,进而滋养生命的“活气”与“朝气”,由人心而至人生和社会,试图以道德美育代宗教,提出了未来社会人生艺术化问题。有学者评价新儒家时说:“新儒家文艺美学思想所表现出的四个重要特点,分别是恪守‘内圣外王’、倡导‘美善相兼’、遵从‘生生之德’以及坚守‘人文精神’,新儒家的文艺思想对于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开拓具有重要作用。”^[13]笔者以为这种评价也完全适用于梁漱溟。当然梁漱溟不仅是个理论家,也是知行统一的实践派。尽管他的生命观、艺术观、社会观难免有主观和模糊之弊,但他立志解读人类生活和文化发展诸多问题的态度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勇气值得称颂。梁漱溟的文艺美学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其中的生生美学思想丰富而新颖,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发掘。

参考文献:

- [1]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 [2]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 [3]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 [4]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 [5] 曹锦清.儒学复兴之路:梁漱溟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 [6]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七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 [7] 杜维明:对话与创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8]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 [9] 梁漱溟.梁漱溟先生论儒佛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10] 杜卫.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 [11] 金雅.人生艺术化与当代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12] 曾繁仁.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背景下中国传统生生美学的提出与内涵[J].社会科学辑刊,2018(6).
- [13] 马林刚.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的特点和价值[J].中州学刊,2013(11).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fe Creation of Liang Shuming's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LIU Yanfen

(School of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Jinan 250022, China)

Abstract: Liang Shuming begins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his middle age, and forms thoughts of the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fe creation. He insists on the stance of life creation, thinking that truth is very important i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that the cre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is a life creation process that is “stimulated and infected” for the purpose of beauty and moves from the body to the heart. In terms of individual life, literature and art has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that “make people’s emotions carried forward and encouraged”, and in terms of social life, literature and art is a kind of dependence of life and food of spirit which can nourish the humans and even the plants and animals. On this basis, Liang Shuming further starts with the lively and fluid characteristics of life itself, and proposes that individuals should get rid of outside disturbances, achieve vitality through intuition, cultivate a gentle and peaceful heart and then nourish the “vitality” and “vigour” of life, deduce the personal heart to the life and society, advocating replacing religion with virtue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putting forward artification of life in the future society.

Key words: Liang Shuming;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artification of life; aesthetics of life creation

(责任编辑 雪 箫;实习编辑 穆林泽)